

史記論贊
輯釋

張大可 輯釋



陝西人民出版社

11(4)/33

1333413

RD07/20

史记论赞辑释

张大可辑释
陕西人民出版社

扉页题字 阴法鲁

55(10)11

E146361

史记论赞辑释

张大可 辑释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商洛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6.25印张 380千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统一书号：11094·152 定价：3.75元

前 言

史记论赞，系指《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这是司马迁仿《左传》的“君子曰”所创造的史论形式。习惯称篇前之“太史公曰”为序，称篇末之“太史公曰”为赞。《天官书》后半、《伯夷列传》夹叙夹议，“太史公曰”置于篇中为论。《日者》、《龟策》两传与《伯夷列传》前后呼应，提示义例，均为论传。书末《太史公自序》为全书总论。篇前作序论，篇末作赞论，通篇为论传，书后总论等多种形式的史论，构成了司马迁系统的史学理论和是非观点，集中地表述了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探索司马迁思想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值得认真研究。学术界研究司马迁思想分歧很大，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对司马迁思想的有关资料作系统的整理，往往断章取义，议论难免偏颇。而《史记》之所以成为不朽的文史名著，其特点之一就是长于有论。因此，集中整理“太史公曰”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二十年前著者已有此宿愿，今日方就，了却一桩心事，其乐如何！

本书辑释“太史公曰”，总题“史记论赞辑释”。通计《史记》全书，序论二十三篇，赞论一百六篇，论传五篇。二十三序，即十表九序，《将相表》无序；八书五序，《礼》、《乐》、《律》、《历》、《封禅》五书有序；世家中《外戚》一序；列传中有《孟荀》、《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货殖》八序。一百六赞，即十

二本纪缺《今上本纪》，有赞十一；八书三赞，《封禅》、《河渠》、《平準》三书有赞；世家二十九赞；列传六十三赞。论传五，即《伯夷》、《日者》、《龟策》、《太史公自序》（通常简称《自序》）四传，以及《天官书论》。凡一百三十四篇，三万零九百三十六字，约占全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百分之六，篇幅不长，而内容却极为丰博，乃为《史记》一书之血气。《汉书·司马迁传》所载司马迁《报任安书》与《自序》是表里之文，计两千三百一十六字，今收列《自序》之后。贾谊《过秦论》三篇，两千三百三十二字，是西汉时人评论秦政得失的定论之作，司马迁十分推崇，直接引用为《秦始皇本纪》的赞语，故本书收为《秦始皇本纪》赞后附录。总计辑释原文三万五千五百八十四字。引文依据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点校本《史记》。整理内容为注释、译文、简论、说明四项。序赞篇目仍依《史记》五体序列编目，唯《货殖列传序》置于《平準书赞》后为附录，因二篇为互补相成之文，蝉联并编以突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史记》五体论赞各为单元，论传独立为单元。《天官书论》实为《天官书》之长赞，不独立成单元。《日者》、《龟策》两传合为一单元，即四论传为三个单元。五体、四传及《报任安书》共九个单元，每一单元有一简要说明。各项整理形式均不株守刻板的公式。注释以简明的释义为主，不作繁琐考证，间有重出条目则重注，不注互见，以省翻检之劳。长文注释分段，译文集中。“简论”和单元“说明”系对司马迁史论体系及内容作简要述评，并辨其资料真伪，供读者参考。

本书构思萌芽于一九六二年求学之时。一九六五年在北京大学阴法鲁先生指导下，以毕业论文的形式，完成了《太史公

自序》的注译。嗣后中断这项工作达十余年。一九七八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了科学的春天，史记论赞辑释工作也重新提上日程。近年来结合“史记研究”专题课的教学，加快了工作进程。部分论赞辑释曾作为教学参考资料印发，在实践中提高和征求意见。著者在撰述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大学阴法鲁先生，北京外语学院程金造先生，河南信阳师院李叔毅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刘乃和先生，武汉大学阙勋吾先生，兰州大学张代经先生等前辈师长的热情指导和鼓励。河南中州书画社编辑陈协桢同志也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特别是程金造先生年近八旬，抱病审阅了全稿；李叔毅先生年近花甲，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仔细审读了本书的八书序和太史公自序两个部分。两先生提出了几十条宝贵的书面修改意见，十分感人。本书定稿时又得到陕西社会科学院《人文杂志》编辑部，陕西人民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同志的大力支持和肯定，表达了司马迁故乡人民的热情，令人感动不已。前辈师长、朋友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怀、支持和鼓励，是对著者莫大的鞭策，谨致以衷心的感谢。此外，兰州大学历史系学员徐日辉同志，赵国华同志，刘长林同志，崔宪涛同志，张学谦同志为本书抄缮，亦在此致谢。

著者限于学识或囿于己见，本书一定还有许多可商榷以至谬误的地方，恳切地希望学人和读者不吝赐教。

张大可

一九八三年七月

目 录

前 言

序 论.....	(1)
十二本纪赞.....	(40)
十表序.....	(73)
八书序·赞.....	(118)
三十世家赞·序.....	(194)
伯夷列传.....	(236)
七十列传赞·序.....	(246)
日者、龟策两列传.....	(359)
太史公自序〔注释〕.....	(380)
太史公自序〔译文·简〕.....	(447)
报任安书.....	(489)

序 论

史记论赞，言约义丰，博大思精，构成了司马迁完整的史论体系。下面就论赞的基本内容作一概括的述评。

一 序赞论为太史公首创的史论形式

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司马迁并没有命名曰序曰赞。《史通》卷四《论赞篇》和《序例篇》正式论列“太史公曰”为序为赞后，才成为通称。《史记》原题《太史公书》，意为太史公所著述之书。太史公本是司马迁对父谈为太史令官之尊称，引用为书名后，也就成了父子相共之名。故史记论赞称“太史公曰”，司马谈发端于前，司马迁完成于后，乃父子相承之作。但是，若要具体区分哪些是司马谈之言，哪些是司马迁之语，却是很困难的。清人方苞及近人顾颉刚、李长之等对司马谈作史均有考证，继之者更不乏其人。这些考证对于探索《史记》成书的历史条件及评价司马谈的史学贡献都是有价值的。《刺客列传》、《郿生陆贾列传》、《樊鄼滕灌列传》三篇之赞，所言及的公孙季功、董生、平原君子、樊噲孙他广年齿差长，似与司马迁不相及。王国维认为，“此三传所论，史公或追记父谈话也。”（《太史公行年考》）。顾颉刚则认为此可证三传，“成于谈手无疑”（《司马谈作史》）。王氏所论比顾氏较为圆通。因《史记》最后完成于司马迁之手，其

父司马谈的著述也只作为资料融入司马迁所定稿的成书之中。特别是作为表述“一家之言”的系统史论，更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史记》中的全部“太史公曰”，均可视为司马迁史论而加以贯通的研究，这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的。因此，本书辑释，总视为司马迁史论，这是需要说明的一点。当然，司马谈发端创造之功，也是不可埋没，不可不晓的。

“太史公曰”形式上是仿自《左传》的“君子曰”，但在《史记》中发展成为序赞论的系统史论，却是司马迁的首创。先秦典籍《国语》、《战国策》及诸子著作间或已有“君子曰”，表示当时有德者之言。有人统计，《左传》有一百三十四条评论，直接引仲虺、周任、史佚、孔子等人的话约五十条，有“君子曰”或“君子谓”、“君子以为”之称的评论八十四条。这样多的评论，已具系统史论的雏形，所以我们说“太史公曰”系仿《左传》的“君子曰”而作。但《左传》的“君子曰”就事论事，还不是具有理论色彩的史论，未能形成一种体系。隋代著名史家魏澹云：“丘明亚圣，发扬圣旨，言‘君子曰’者，无非甚泰，其间寻常，直书而已。”（《隋书·魏澹传》）。这就是说，左丘明的史论，只限于对具体事实的褒贬，可以说是一种直书。评论方式，主要是博采君子之言，亦断以己意。如文公二年《传》跻鲁僖公之“君子以为失礼”云云，《国语·鲁语·夏公弗忌改昭穆之常》条作宗人有司之言；襄公三年《传》之“君子谓祁奚於是能举善矣”，二十一年《传》作晋叔向之言，曰“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所以宋人林尧叟曰：“《左传》称君子曰，多是取当时君子之言，或断以己意。”（《左传》隐公元年林注）。而《史记》的“太史公曰”，全书浑然一体，每序每赞，无论长短，自为一体，具

有浓厚的理论色彩，并不只是就事论事的评论。“太史公曰”，内容丰博，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历史、伦理、世俗、形势、人事等等，往往补篇中所未备。

“太史公曰”，议论宏阔，笔势纵横，言辞精练，旨义深微，或考证古史，或叙游历所得，或提示取材义例，或明述作之旨，或褒贬人物，或纵论史事，或隐微讥刺，皆直抒胸臆，观点鲜明，构成了系统的史学理论。司马迁所引典籍及君子之言，如《诗》、《书》、《论语》、孔子、诸子等，皆化为自己的语言。还大量引用诗赋歌谣及鄙语俗谚来加强评论的生动性和通俗化。

“太史公曰”的形式既整齐而又灵活。所谓整齐是指“太史公曰”分为系统的篇前序论，篇后赞论，夹叙夹议为论传三种形式。大段的恢宏议论置于篇首为序论，集中于十表、八书及类传。十表、八书及类传都是贯通古今的，序论即作贯通性的概括，最具理论色彩。本纪、世家、列传皆篇末置赞论。三体皆叙人物，故赞论重点褒贬人物，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论传提示义例，《自序》集中明述作之旨，为全书之总纲。序、赞、论三种形式整齐而集中，显系匠心布局。所谓灵活，即形式并不刻板，在整齐之中有变通。如十表中《将相表》有倒书无序，即创无字之序以衬托倒书，示例更为鲜明。八书中，《礼》、《乐》、《律》、《历》有序无赞，《河渠》、《平準》有赞无序，《封禅》有序有赞，《天官》夹叙夹议。十类传中，《刺客》无序有赞，《儒林》、《货殖》无赞有序，《循吏》、《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有序有赞，《日者》、《龟策》借题发挥，以序事为论。灵活变通的形式，表现了司马迁的宏阔气度和无限的创造活力。变体，即

破例，是为了切合内容的需要而作的变通。《外戚世家》及《孟子荀卿列传》两篇实质是类传，故作序以明其类。《孟荀》用合传之目标题，只不过是突现两位儒家大师的历史地位，而内容却是一篇先秦诸子类传。《刺客列传》本应编列在循吏之后，与类传的时序并编，而司马迁有意穿插在辅秦人物中间，与吕不韦、李斯、蒙恬等人并列，这是对比见义，表现了司马迁的反暴政思想。因为刺客都是反暴人物。《刺客列传》无序，与《将相表》无序同例，以无字之序引人注目，发人深思，收到强烈的对比效果。破例为体是《史记》的一大特色，全书五体结构均有破例。历史本身是丰富多采而又变化万端的，怎么能用死板的格式来作形象的反映呢！但质的规定性又必须通过格式来反映。既有格式，又有变通，才能妙尽其理。立例又破例，正是司马迁卓越史识的一大表现，所以“太史公曰”呈现出丰富多姿的形态。

对司马迁用“太史公曰”所创造的序、赞、论的史论形式，清人章学诚作了崇高的评价。他说：“太史叙例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所谓‘不离古文’及‘考信六艺’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尝不反复自明也。”（《文史通义·史注》）。但是象章氏这样的赏音者并不多见。唐刘知几就扬班抑马，推重班固之赞有“典诰之风”，而认为《史记》为例不纯，甚至批评史记论赞“淡泊无味”，是“苟炫文采”的画蛇添足（《史通·论赞》）。实际上，班赞是模仿“太史公曰”而作，在辞章和形式上好象比“太史公曰”庄重、典雅，但其史识义例却是无法和“太史公曰”比拟的。唐代另一学者，撰述《史记索隐》的司马贞，则认为史记

论赞脱离了述史内容，故重新为之一作“赞”，称“索隐述赞”。但司马贞的“赞”，却不是史论，只不过是史传内容的复述，以韵文形式作的摘要，确实称得上是标准的“荀炫文采”之作。

不明司马迁的史识，就难以评论司马迁的史论，甚至会否认司马迁的创造。近人余嘉锡先生在《太史公书亡篇考》中否认司马迁创作序赞就是一例。他说：“太史公以篇为卷，每卷自为起讫，即是一篇文字。其间或分或合，或叙事，或议论，本无一定之例。遇其意有所感发，更端别起，则称‘太史公曰’，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本无所谓序与赞也。”又说：“史公自序，即百三十篇之序也。若于篇首复别为之序，擘拇骈枝，古人无此体也。”前已指出，序与赞之名确非司马迁自题，但以“太史公曰”发端的各种史论形式，则灿然赫然，无庸置疑。余氏认为“太史公曰”是司马迁行文“遇其意有所感发，更端别起”而发的议论，也就是把“太史公曰”降到“君子曰”的水准上，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既是“遇其意有所感发，更端别起”，则篇首之“太史公曰”就无着落，岂非未行文而先有感发欤？余嘉锡先生以张晏所云十篇亡书目录为不易之言这一先入之见立论，不承认《礼》、《乐》、《律》三书序存，更不承认《三王世家赞》为司马迁手笔，故否认司马迁创造了序赞的史论形式，真可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余氏谓“古人无此体也”是说对了。司马迁师法“君子曰”而又作了超卓前人的大胆创新，使历史编纂成为真正的史学论著，《史记》提供了典范。其后“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论，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昫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

（《史通·论赞》），名称虽殊，但都是效法司马迁作史论。

二 论史记取材义例

编纂历史著作，不同于文学作品，以抒情见意，辞必己出；也不同于哲理著作，以空言论道，设寓说理。历史著作，应当做到言有所据，事有所托，字字句句，均有来历。司马迁正是在此基础上，广博地搜求史料，并把他的理论见解和实践经验一一载入史记论赞中。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是司马迁搜求史料的一条总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史记》取材，无所不包，这就决定了《史记》内容的丰富性及复杂性。这句话也是司马迁提出的史学理论，他认为历史学既要概括人类社会的一切文化发展，就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于是他创造了五体的表述形式来条理包罗万象的人类文化历史。司马迁采集史料的方法，可以归纳如下：

（一）“绌史记石室金匱之书”，即阅读皇家所藏图书档案。汉惠帝四年，除挟书之律，广收博采。到武帝时，皇家藏书已十分丰富，宫内有天禄阁、延阁、广内等藏书馆，外朝有太常、太史、博士官署藏书。司马谈、司马迁以职责攸关，主管其事。《自序》云：“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司马迁所读《诗》、《书》、《春秋》、《国语》、《谍记》、《春秋历谱谍》、《秦记》、《列封》、《功令》等等，皆国家所藏图书。故司马谈临终遗言，司马迁必为太史。“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绌史记石室金匱之书”，这是司马迁在《自序》中特

地大书的一笔，示承继父志，续纂其业。太史令，秩六百石，是“陪外廷末议”的一个卑官。但汉制，“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付上丞相”（《自序集解》引《汉仪注》），这给司马迁修史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曹相国世家》所录曹参军功，即《功令》所载之文。《扁鹊仓公列传》载仓公所对医案为皇室所藏。《樊鄴滕灌》、《傅靳蒯成》等传亦多录《功令》之文。汉史诸表更是依赖于《功令》、《列封》、《令甲》等资料而制成表。秦焚《诗》、《书》，图籍散乱。汉朝建立，有赖于国家的大力收藏，才给司马迁提供了修史的条件。《史记》有三十五个篇目涉及司马迁所见图书，序赞涉及有二十余篇，如《五帝本纪赞》、《三代世表序》、《十二诸侯年表序》、《管晏列传赞》、《自序》等。通计载于《史记》中的司马迁所见书共一〇三种，其中六经及训解书二十四种，诸子百家书五十二种，历史地理及汉室档案二十种，文学书七种。这仅仅是司马迁因事论及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于文献典籍是何等的重视。

（二）取资金石、文物、图象及建筑。《秦始皇本纪》载录了《泰山石刻》、《琅邪石刻》、《之罘石刻》。《孔子世家赞》云，司马迁适鲁观孔子庙堂车服礼器。《留侯世家赞》云，司马迁考核留侯张良画像。《春申君列传赞》云，司马迁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蒙恬列传赞》云，司马迁观蒙恬所筑长城、亭障、直道。

（三）游历访问，实地调查。《自序》记载了司马迁二十岁时南游江淮的壮举。他还奉使巴、蜀以南之游，此外，还在几十年间扈从武帝之游。司马迁足迹遍于全国，“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搜集了有关上古历史的

传说，考实了西周建国经营洛邑的情况，纠正了学者所传之误。至于调查战国故事，汉初故事，古战场形势，个人遗事，更至为详悉。司马迁十分重视普通老百姓的口碑、传颂，并在《史记》中留下了记载。如适大梁之墟，求问夷门及秦灭魏，“墟中人曰”云云；载樗里子事迹，“秦人称其智”云云；至淮阴，“淮阴人为余言”云云；……此类例证，不胜枚举。这说明司马迁的调查，深入了社会下层，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例如他在齐鲁考察，就曾“厄困鄆、薛、彭城”，但终于了解到薛地风俗，“其闾里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再如《货殖列传》对全国都市经济、各地物产、习俗的记载，也是从游历调查中得到的。论及游历的论赞有《五帝本纪赞》、《周本纪赞》、《封禅书赞》、《河渠书赞》、《齐太公世家赞》、《魏世家赞》、《孔子世家赞》、《魏公子列传赞》、《屈原贾生列传赞》、《蒙恬列传赞》、《淮阴侯列传赞》、《樊郤滕灌列传赞》，以及《伯夷列传》、《龟策列传》及《自序》等共十五篇。

（四）接触当事人或他人的口述材料。此见于《赵世家赞》、《樊郤滕灌列传赞》、《田叔列传赞》、《韩长孺列传赞》、《李将军列传赞》、《卫将军骠骑列传赞》、《游侠列传赞》等篇。

（五）采集歌谣诗赋，里语俗谚。此分三项。一是乐府歌谣，文人诗赋；二是民歌童谣；三是里语俗谚。《史记》中所载这三项资料共五十六条。其中第一项六条，第二项十四条，第三项三十六条。司马迁广泛采集民歌童谣，里语俗谚，标明“谚曰”、“语曰”、“鄙语曰”云云，并大量引入赞中，用以褒贬人物，就象引用经典一样郑重。歌谣里语，寓有平凡的

真理，是人民群众生活实践的结晶。司马迁引用歌谣里语，正是他史识过人的一种表现。

（六）搜求被秦始皇焚灭了的古诸侯史记。《六国年表序》说，秦焚《诗》、《书》，诸侯史记尤甚，“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秦只焚灭了官家之藏，而民间尚有残篇。如《燕召公世家》载，燕孝王“三年卒，子今王喜立。”又载，“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这是公元前255至前251年事，下距司马迁述史一百四、五十年，而两称“今王”，显然是抄录燕国史记而改写未竟的痕迹。又如《廉颇蔺相如列传》载秦赵会渑池，赵王鼓瑟，秦御史书“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挟秦王击缶，亦召赵御史书“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赵御史所书必不载于秦史记而是据赵史记写下的。又年表、世家载各诸侯国史事用第一人称“我”，不可能全部据秦史记回改，亦当有一部诸侯史记。这些例证是《史记》取材于“诸侯史记”的有力佐证。

上述六种途径，足以反映司马迁搜求史料的宏博、辛勤和实践着“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原则。对这些丰富博杂的材料，司马迁是怎样抉择和选录的呢？从史记论赞中，我们大致可以归纳为六条义例。

（一）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伯夷列传》云：“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孔子世家赞》云：“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明王守仁说：“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传习录》卷一）。王守仁的“五经亦史论”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嗣

后清人顾炎武、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的论断，受到了思想界、史学界的高度评价。其实早在西汉，司马迁就以《六经》为史料，撰写《史记》。《殷本纪赞》云：“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五帝、夏、殷、周诸本纪，三代、十二诸侯两年表，齐、鲁、燕、晋、宋、卫、孔子诸世家，以及仲尼弟子传等篇主要以六艺经传为史料。至于司马迁以孔子言论作为褒贬人物的一个尺度，贯穿于《史记》序事及论赞中，俯拾即是，就不一一具引了。

（二）择其言尤雅者，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见《五帝本纪赞》、《三代世表序》、《仲尼弟子列传赞》等篇。司马迁作《五帝本纪》就是一个“择其言尤雅者”，并以“古文”记载为主要依据的典型例证。这篇三千四百五十字的本纪（赞语未计），在文献方面至今犹能按核的典籍就有十余种：①《尚书》，②《大戴礼记》（《五帝德》、《帝系姓》是其中篇名），③《国语》，④《左传》，⑤《世本》，⑥《庄子》，⑦《孟子》，⑧《韩非子》，⑨《战国策》，⑩《吕氏春秋》，⑪《礼记》，⑫《淮南子》。此外还有逸失的典籍如《百家》、《谍记》等。司马迁广泛征用古文资料，重视运用原始资料。所谓古文就是指用先秦文字书写的典籍，《六经》则是古文的主体。所以司马迁征用古文要“考信于六艺”，择其言尤雅者而记述。例如《五帝德》述黄帝，其中有“黄黼黻衣，大带黼裳，乘龙扈云”的记载；述颡顼，有“乘龙而至四海”的记载；述帝喾，有“春夏乘龙，秋冬乘马，黄黼黻衣”的记载。这些，《左传》、《国语》等均不载，因为这是不可信的。司马迁均予以删去。

（三）纪异而说不书，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天官